

王国维诗学 研究

佛维
著

一九九九·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诗学研究/佛雏著 - 2版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
(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

ISBN 7-301-01163-6

I 干 II 佛 III 诗歌-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王国维 IV 1052

书 名 王国维诗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佛雏

责任编辑 丛睿

形态设计 林胜利

标准书号 ISBN 7-301-01163-6/B·8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75 印张 38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二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5 00 元

策划人语/江溶

《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草创于八十年代中期。在那百废待举,学术文化刚刚复苏的年代,她曾像一泓清泉,滋润过不少饥渴的心田。许多读者朋友也正是由于她而认识了重建不久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早年设有出版部)。

《文艺美学丛书》承继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将文艺美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传统美学的另外两个维度——美的哲学和审美心理学亦给予足够的关注。丛书着力组织国内学者的专著,同时也兼及“他山之石”的译介。

丛书由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叶朗、胡经之、金开诚、阴法鲁、董学文、王岳川、王宁、周宪等先生参加了编委会的工作。编委会的常务工作主要由叶朗、胡经之和江溶负责。当时健在的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曾给编委会的工作予以热情的关怀和许多具体的指导。

经过十余年的耕耘,《文艺美学丛书》已出书三十种。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不仅在当时因某种填补空白的开创性意义,或因对某个领域的专深研究成为后人涉及该领域时不可或缺的著述,而引起广泛的关注,而且即使在学术多元化、出版事业日益繁荣的今天,仍不失其智慧的光彩和学术的价值。这就使我们编选这套《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奉献给新一代的读者,有了必要和可能。此次精选计十种,皆为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以学科的内在联系为序。

《文艺美学丛书》这方小小的园地所以能自具面目,有所收获,首先应当归功于所有的作者和译者。他们的劳动成果连同他们求新的精神、务实的学风,以及力图将学术与社会相联系的责任感,无疑都将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财富。同时,我也要真诚地感谢为这套丛书呕心沥血的文艺美学丛学编辑委员会的诸位同仁。特别是深深地怀念已故多年的朱光潜、宗白华二位先生。薪不传火传,他们的睿智哲思、大家风范将超越他们的生命,滋养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这套精选丛书权作为我们的一瓣心香,奉献在他们的灵前吧!

我们这套精选丛书付梓之际,正值影响深远的世纪之交,又欣逢北京大学百年华诞,可谓生逢其时矣!愿她的问世,能为北大学术传统的承传续上一棒柴薪,为新世纪的人类精神家园增添几许绿色!

一九九八年元月
于北京大学寒暑斋

目录

代序/王国维前期的生活经历与诗学研究的大体过程/1	
第一章 王国维前期的思想倾向,方法论,及其与诗学研究的关系/11	
第一节 他的带有反封建色彩的伦理观/14	
第二节 他的中西“化合”的“悦学”说/42	
第三节 他的比较先进的方法论/51	
第二章 王国维前期(第一时期)的几种重要诗论/57	
第一节 评王国维的悲剧说/对他的《红楼梦评论》的再评价/61	
第二节 评王国维的喜剧说(包括“欧穆亚”说)/83	
一 “笑者实吾人一种势力之发表”/83	
二 “等闲讽刺,轻视滑稽”/87	
三 “欧穆亚之人生观”/93	
第三节 评王国维“第二形式之美”说(即“古雅”说)/98	
第四节 文学人物的“实践理性”与“自律”/118	
第五节 评王国维的美育说/124	
一 以“美术”代宗教/124	
二 美育的“第一目的”与“第二目的”/129	
三 辨明“优美、宏壮”与“眩惑”与“古雅”的界限/134	
第六节 评王国维的《人间词》(他的诗论的一种艺术实践)/138	
一 “人间”与“梦”/139	
二 “思量”与“游戏”/141	
三 “天眼”与“眼中人”/146	

四	“自遂”与“相媚”/149
五	“悼亡”与“绮语”/153
第三章	王国维前期(第二时期)的诗学核心“境界”说/159
第一节	“境界”说的传统渊源及其四种对待关系/162
一	“境界”(意境)这一概念在我国诗学史上的大体演变过程/162
二	“境界”构造过程中的四种对待关系/171
第二节	“境界”说与叔本华美学的关系/“合乎自然”与“邻于理想”试解/185
第三节	“境界”说的两项审美标准/兼谈“境界”为本、“兴趣”“神韵”为末/207
第四节	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237
第五节	“境界”说三题/250
一	“情境”——“专作情语而绝妙者”/250
二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253
三	“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258
第六节	为“三境”说进一解/261
第七节	王国维“境界”说的三个重要观念/269
第四章	王国维前期(第二时期)与“境界”说相关的几种重要诗论/285
第一节	王国维“自然”说二题/288
一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288
二	“雾里看花,终隔一层”/295
第二节	“赤子之心”说及其他/302
一	“主观之诗人”与“赤子之心”/302
二	“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307
三	“恢谐”与“严重”不可缺一/311
第三节	王国维与尼采美学/315
一	“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316
二	悲剧的喜感与“势力之欲”/318

三	蜡祭与“酒神祭”/323
第四节	王国维与席勒美学/331
一	“形式——假象”意识/331
二	“游戏——自由”意识/338
第五节	王国维诗学与海甫定“感情心理学”/346
一	以“同情”为根柢的“欧穆亚之人生观”/347
二	“理想的原质,虽执写实主义者亦不能离之”/351
第六节	王国维在诗的发展观上的重要见解/358
第五章	王国维少年时期与晚期的审美观/365
第一节	王国维少年时期审美思想述略/367
第二节	跋新发现的王国维遗文《先太学君行状》/兼谈王氏诗学的家学渊源问题/394
第三节	从王国维的美学观看他的“自沉”/404
	简短的结语/425
	附录/427
	王国维诗学著述系年/429
	后记/462
	再版附识/465

代序/王国维前期的生活经历与诗学研究的大体过程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浙江海宁人,出身于一个濒于破落的“书香”家庭。在西方文明“滔滔而入中国”的晚清末期,他抱着“发明光大”祖国文化学术的热忱,奋力钻研和引进西方哲学美学(以德国康德、叔本华学说为主),并结合传统诗论,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诗学体系。他的一系列哲学诗学著述,在我国新旧社会、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起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

我们探究王国维的诗学遗产,主要就他前期即从戊戌变法(1898)至辛亥革命(1911)这一期间的诗学论著与创作而言。戊戌变法以前属于他的少年时期,他照例读诗书、习举业、考秀才。其间也有审美、有创作,总的看,不脱旧伦理旧诗学的规范之外。如从社会、历史人物、事件中、自然中寻找诗情与美,从“真”之一字中寻找诗情与美;诗以儒家的人伦、教化为依归,故与社会功利以至国家种族的兴亡关系密切;视阳刚的美重于阴柔的美,等等。而在时代思潮冲击下,一种对“新学”的向慕,对某种新的美的憧憬,却已在他的诗作中郁勃、跃动,甚至显得无可遏抑。^① 此为他诗学思想的胚孕阶段,从旧学向往新学的阶段。它跟王氏前期后期的思想演变,有其相承相戾的错综关系,故仍值得重视。辛亥革命,王氏随清室遗老罗振玉东渡日本,在罗的直接影响下,又从“西学”返回到“尼山之学”,专以“反(返)经信古”为己任,因而深深地“悔其少作”。据罗振玉言,当时王氏

① 参看本书《王国维少年时期审美思想述略》。

“自怵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篋《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①，其态度之决绝如此。在此时期（1911—1927），王氏从诗学转向古史学。虽有《宋元戏曲史》的结集，其中亦涉及对元曲文章之美学评价；又感时伤遇，友朋唱酬，以至“宫廷”（被废黜的溥仪小朝廷）应制，时有诗文之作，亦不能不涉及他的美学观点，大抵康、叔余影仍在，道家而外，前期曾被非难的儒家诗论，如“征圣”、“宗经”、“诗史”、“美刺”等，又转而成为王氏之所依据。

王氏前期的中西“化合”的诗学思想，以“境界”（意境）说为中心，已自体系初具，又有其方法论上的进步性，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我国文坛（包括词学界、戏曲界）上，独树一帜，颇有“截断众流”之势。它在打通中西壁垒、架设新（现代）旧（古代和近代）之间的桥梁方面，显出了自己的特色。在今天看，这个体系立足于某种唯心哲学，除其中不可泯没的精粹部分外，也确有难以消解的内在矛盾。但也如同龚自珍所说：“但开风气不为师”，就敢于突破旧垒，开创新的局面言，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劳绩也决非他自己或者任何人可以“摧烧”得了的。

王氏的“旧学”，包括文学史学，均在少年时期（1877—1897）打下了较深的根基。其忧郁沉潜的气质，天才的禀赋，已于此期开始显露。家学渊源与海宁文风（重诗文、历史考据）亦在其中起过相当作用。其由“旧学”转向“新学”，则缘于甲午（1894）的政治事变。他在《三十自序》（作于1907年）中云：“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②其后离家赴沪，他的这一致力“新学”的迫切意愿始得渐次实现。这里又分为第一时期（1898—1907）——治哲学兼及诗学，与第二时期

① 罗振玉《海宁王忠愍公传》。

② 见《静安文集续编》。

(1908—1911)——治诗学浸及史学。

1898年春,王氏刚满二十岁,“是时钱塘汪穉卿舍人(康年)创《时务报》于上海,邀上虞许默斋孝廉司书记,倩先生(按指王氏)为之代。先生于正月中抵沪就事,所得资甚微。时上虞罗叔言先生(振玉)方创农学社,迺译东西各国农学书报。以乏译才,乃以私资设东文学社于新马路之梅福里,聘日本藤田剑峰(丰八)博士为教授。五月朔,学社开学,先生请于馆主,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按,这位藤田博士正是王氏研究“西学”的一位启蒙导师。藤博学而尤萃力于史,著有《东西交通史之研究》一书。藤田之于王氏,亦犹藤野之于鲁迅。“时同学仅六人,罗先生偶于其同舍生扇头,读先生咏史绝句,有‘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按,当作“东”)头望大秦’之句,乃大异之。”^①按,此为王氏与罗相识之始,他得到罗的赏识扶掖,深感其私人厚遇,在往后的治学与政治道路上,他受这位古史学家、考据家、清室遗老的影响真是至深且巨。

是年九月,戊戌政变,《时务报》停刊,罗仍使王“治社(按,东文学社)中庶务,而免其各费,至是乃得专力于学”^②。王氏《三十自序》云:“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按,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次年(1899)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此为王氏接触康德(1724—1804)叔本华(1788—1860)哲学之始。按,田冈的自传《数奇传》云:“予早年有厌世思想的暗影,对康德叔本

①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

②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其中“五月朔”,据王氏《致许家惺》(1898年3月1日),应为“二月六日”,见《王国维全集 书信》。又,王氏之父王乃誉《日记》手稿,“戊戌三月朔,接静巢,所陈从东文骤难入”,亦可为证。

华的哲学深为醉心”，故为文多引叔氏说。又王氏肆力学英文亦始于此时。

1900年冬，王氏得罗氏之助，留学日本。由藤田介绍，进入东京物理学校肄业。次年（1901）夏因患脚气病返国。^①1902年罗在上海任南洋公学（盛宣怀主办）附设东文学堂监督，王氏“即为校之执事。暇更从藤田博士习英文，兼为罗先生编译《农学报》及《教育世界》杂志，撰述乃益富”^②。其《三十自序》亦云：“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我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

1903至1905年，王氏先后在通州（南通）师范学校（张謇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在苏州，罗任监督），主讲伦理学等课程。1906年，王氏随罗赴北京；次年，由罗推荐，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局编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直到辛亥革命时止）。在此期间（1902—1907），他一直从事康、

① 据王乃誉《日记》手稿，王氏于庚子（190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离沪赴日留学。（“庚子十二月十五，接静稟，知抵沪，俟藤师到与马友偕”，同月“二十三日，接静十九稟，知藤田已到。伊二十一启程，有甬人马偕，一路至东京，皆有照应”。又，辛丑〔1901〕年正月十二日，乃誉托东京早稻田大学陆宗輿转交致静安一函“年前连接二稟，知二十一定乘博爱丸启行，迄今二十日，尔到东后，寓居何所？饮食水土若何？何时入学堂？”）于辛丑四月二十六日返国。（“辛丑四月二十九日，接静沪二十七函，谓前礼拜三，以病须台，差食物，医者令暂归国，于是由东京起程，二十六抵沪。”）

赵谦将王氏赴日留学，系于辛丑年；返国，系于壬寅即1902年，各后移一年，误。

乃誉壬寅三月十六日记，“接静稟，谓叔蕴大开译局，需东译三四十人，嘱静赴日本请通译文译手，月内动身，一月可归。”旋王氏于三月底赴日，五月初返沪。此为王氏第二次赴日，与留学无关。

②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

叔哲学美学的研究。其文集《自序》(作于1905年)云:“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丑)壬(寅)之间(1901—1902)。癸卯(1903)春,始读汗德(按,康德)之《纯理批评》(按即《纯粹理性批判》),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意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康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①至《三十自序》又云:“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1903)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1905)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1907)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

上面的引述充分表明,在第一时期,王氏对康德特别是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是何等的倾倒。此似有如下数因:一、当时强邻逼侵,国势阽危。王氏一介书生,思以振兴学术为救亡之根本,而哲学为诸学之冠冕。在他看,康叔哲学又属哲学中之“第一义”。二、王氏赋性“忧郁”,庄列思想盖所固有,今于叔氏之书而得一大印证。而其体系之“绵密”“精锐”处,又似足补庄列诸家之所不及。这比之苏子瞻初读《庄子》那种若有夙契之感,实更有过之。三、王氏少年时期颇具英雄崇拜心理(观其《咏史》诗可见),若康若叔,在当时王氏眼里,均属“旷世之天才”,所谓“丹凤在霄,百鸟皆暗”^②。四、且叔氏之书不甚艰晦而富文采,叔氏自称其书

① 《静安文集自序》,见《静安文集》。

② 《汗德像赞》,见《静安文集续编》。

不缺乏“美”，亦哲学，亦文学。这对王氏也是完全相投的。

依据叔氏学说，王氏视文学艺术为“永恒”真理之“记号”，为人生解脱之手段。他把诗学研究当作他的哲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刊于1905年的《静安文集》及以后《续编》中的一系列哲学论文（如《论性》《释理》《原命》《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近年之学术界》《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等），诗学论文（如《红楼梦评论》《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教育杂感四则》《人间嗜好之研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去毒篇》《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等），以至诗词创作等，大多是第一时期研究康叔学说的辛勤结晶。辛亥东渡日本后，王氏从此不再提及“西洋哲学”了，但康叔之书在他心灵上打下的烙印，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他的生命的终局。

1908至1911年，王氏的研究从哲学改为传统词曲。何以有此转折，他在《三十自序》中有明确的论述。“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这段自白对我们了解王氏前期内心的思想矛盾，自属极端重要。这里有两点值得提出：

第一，从哲学“移于文学”的这一转折虽是实在的，但也属大体区划，并非前后截然两概。王氏“于治哲学之暇，兼

以填词自遣”。1906年，他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刊出了他自己的词作《人间词甲稿》（作于1904—1906年）^①，次年又续刊了《人间词乙稿》，《诗稿》则刊入《文集》中。他的哲学研究与诗学研究、诗词创作原是携手并进的。至于《人间词话》（作于1906—1908年）虽属第二时期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基本理论仍与康、叔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枝，或一种艺术哲学）关系密切。故“移于文学”，实并未真正放弃哲学，只是将某些哲学——美学原理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词学、曲学领域的研究与创辟而已。

第二，王氏徘徊于“哲学家”与“诗人”之间，这颇有点类似为王氏称述过的希尔列尔（即席勒）曾经经历的一种矛盾心境。席勒在《给歌德的信》（1794年8月31日）中云：“我的理解力是按照一种象征方式进行工作的，所以我像一个混血儿，徘徊于观念与感觉之间，法则与情感之间，匠心与天才之间。就是这种情形使我在哲学思考和诗的领域里都显得有些勉强，特别在早年是如此。因为每逢我应该进行哲学思考时，诗的心情却占了上风，每逢我想做一个诗人时，我的哲学的精神又占了上风。就连在现在，我也还时常碰到想象干涉抽象思维，冷静的理智干涉我的诗。”^② 席勒这段话恰好成了王氏此际“最大之烦闷”之最贴切的注脚。就天赋言，王氏有诗人之“热”，又能为哲学家之“冷”，而将“法则与情感”、“匠心与天才”融铸一起，亦优为之。究之两者总往往互相“干涉”，互相抵消。此之谓“苦寡”“苦多”。王氏“自待甚高”，在任何一门学术研究上，从不作“第二流”想。他自知：“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③。他

① 参看本书《王国维诗学著述系年》中“1905年”项下关于静安词系年的说明。

②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第89页。

③ 《三十自序》（二）见《静安文集续编》。

的哲学论著如前举《论性》诸篇，严格地讲，都属就前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的哲学史的范围，虽有所批评、扬榷，大抵仍本康、叔原理，而非“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在他看，后者乃是一种“非愚则狂”的荒谬念头。

更重要的是，“哲学”亦非人间乐土，其间唯心、唯物、“可爱”、“可信”之际，冲突亦颇剧烈。王氏酷“爱”康、叔诸人“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在此中反复盘旋之后，始深感这座“琼楼玉宇”确乎有点“高处不胜寒”，以之远望、怡神则可，以之“安身立命”，究无个落脚处。即如康、叔那一套庄严无比的伦理学，或将其实行推到永不可即的“彼岸世界”，或以“释迦基督”所不能解决之根本课题（如“物我一体”、人生“解脱”等）责诸一般“众生”。“何处云中闻犬吠？至今湖畔尚乌号”^①，王氏对此早就疑雾重重。且如叔氏自身的性行恰与其学说自相背戾，故王氏终于“悟”出：“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②，此之谓“不可信”。明知其“不可信”而“爱”之，这种“爱”如何持久？至于“可信者不可爱”如王氏所举“实证论”“快乐论”等，一则此类哲学派别未必尽可凭信；二则在王氏看，此类学说可与谈形下的“功利”，而未可语于形上的人生真谛，不足构成人生真正之“慰藉”，说虽近“实”而乏诗意之“美”，此其所以“不可爱”。于是“疲于哲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话虽如此，哲学犹如人的“眼睛”（叔氏语），可以“疲”，却又绝不可“无”。王氏所设想的诗歌与哲学“二者之间”，这个“之间”不是别的，正是诗学。人们看到，第二时期王氏主要从事这个“之间”的研究，却仍不能不时时借用康、叔的“眼睛”。

《三十自序》又云：“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

① 《平生》，见《静安诗稿》。

② 《静安文集自序》，见《静安文集》。

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按，王氏《人间词》中的哲学因素（主要为叔氏悲观哲学、美学）极为浓郁，他对自己词作之高度自负、自信如此，从某一意义说，实即对叔氏哲学的继续肯定。他的影响深远的《人间词话》，其基本原理之建立与展开，均于康叔美学有所吸取。王氏振兴我国戏剧的壮“志”，在他的《宋元戏曲史》这一划时代著作中，获得了重大的补偿。此书中有宋元戏曲的审美评价、伦理学评价，与《词话》所持原理基本一致。可见第二时期王氏的诗学研究创作，始终不曾与康、叔哲学美学真正脱节。

大抵王氏治学，凭借某种哲学原理与新的科学方法，既已完成某项研究并取得相当杰出的成就，此后兴趣精力即转而之他，也就无须乎再回顾这些旧物了。此不独前期如此，后期亦然。他从不以一隅自限、一得自喜，总处在某种新的开发之中。“黑海东头望大秦”，他好像永远葆住了这一分踊跃心情。

至于辛亥以后从诗学又移于古史学研究这一重大转变，固为东渡流亡这种政治情势所决定，但也有其发展的内在线索。王氏十五岁正式读书（前此举业除外），就从“汉四史”开始。据他的少年同学陈守谦回忆，当时他曾“专力于考据之学”^①，薄帖括而不为。他的父亲（乃誉）能诗文书画，又讲究金石考据。在清代，他的乡邦（浙江海宁）有个重史学、精考证的学风传统。王氏少年时期的诗文创作现存下来的，也只是曾被罗振玉称赏的《咏史》二十首。在《词话》写作时期，王氏亦颇注意前代词家、词集的考订整理。如1908年，据《花间》《尊前》诸集及《历代诗余》《全唐诗》

^① 陈守谦《祭王忠愍公文》，见《王忠愍公哀挽录》。

等,辑成《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1909年,草《校补南唐二主词跋》《跋蜕岩词》《跋赤城词》等。1910年成《清真先生遗事》一卷。余如《片玉词跋》《桂翁词跋》《花间集跋》《尊前集跋》《草堂诗余跋》《宋旧宫人诗词跋》等,大都在这一时期写成。戏曲研究方面更是如此。1908、1909年草成《曲录》六卷,同时《戏曲考原》《宋大曲考》《优语录》《曲调源流表》(此书已佚),以及《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等亦均次第完成。这些为1912年写成的《宋元戏曲史》作了最充分的准备。要之,无论在哲学研究或诗学研究中,王氏始终极其重视有关的史的考察,可以说,自少至老,他的史学、考据方面的兴趣是一以贯之的。

促成上述转变的另一心理因素,则跟前期研治哲学、诗学一样,以此远离末世衰乱景象,求得某种人生慰藉。“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①,对王氏后期的治古史,也是基本适用的。

^① 《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见《观堂集林》卷二四,《长短句》。